

# 易地扶贫搬迁中抗逆力动力机制的建构

——基于渝东 M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考察

魏爱春,李雪萍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建档立卡搬迁户应对贫困的动力机制、生计策略及抗逆力结构之间密切关联。作为一种有较强反思性与能动性的范式,抗逆力集适应与转换于一体。适应即主体学习知识与规避风险的能力,转换即主体更新生存状态的能力。适应与转换作为抗逆力建构的两大机制,紧密联系,前者为后者奠定基础。由适应走向转换的过程中,因学习能力、缓冲能力与自组织能力的差异性,搬迁户内部出现三种应对贫困的生计策略与三种不同的抗逆力结构。短距离摆动的搬迁户通过个体经营与合作经营建构生存型抗逆力;长距离摆动的搬迁户积极开展就业创业活动建构发展型抗逆力;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依靠多样化策略与支持建构互补型抗逆力。三种抗逆力结构并存,意味着搬迁户应对贫困的复杂样态。

**关键词** 抗逆力; 动力机制; 适应; 转换; 搬迁户

**中图分类号:**C 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9)05-0037-09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9.05.005

易地扶贫搬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体系中作用显著,是一种兼具减贫、环境保护与和谐发展等多重目标的扶贫方式。目前,学术界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展开。宏观层面而言,研究者侧重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的原因、机制及搬迁户后续发展中的社会融入与适应问题,主要理论视角有空间贫困理论<sup>[1]</sup>、区位理论<sup>[2]</sup>、“推—拉”理论<sup>[3]</sup>、系统理论<sup>[4]</sup>、外源式发展理论<sup>[5]</sup>、社会排斥理论<sup>[6]</sup>与社会文化转型论<sup>[7]</sup>等。微观层面而言,学者们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sup>[8]</sup>、脆弱性视角<sup>[9]</sup>及公平视角<sup>[10]</sup>,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后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通过搬迁前后贫困群体生计资本的变动与生计方式的变迁<sup>[11]</sup>,研究者指出,易地扶贫搬迁对搬迁户的生计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有利于提升搬迁户生计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提升搬迁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sup>[12]</sup>;另一方面,搬迁户在生计发展方面会出现差异化需求无法满足、发展能力不足、帮扶责任不够等问题<sup>[10]</sup>。为应对搬迁后出现的生计困境,学者们认为应通过提供心理疏导<sup>[13]</sup>、经济支持<sup>[14]</sup>、职业技能培训<sup>[15]</sup>、产业帮扶<sup>[16]</sup>、社会保障<sup>[17]</sup>等增加搬迁户的生计资本拥有量,为他们重新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计空间<sup>[18]</sup>。

综上所述,学术界虽详细论述了易地扶贫搬迁后贫困群体的生计问题,但“客体化”“静态化”现象严重。搬迁后,内生动力是贫困人口生计可持续的关键。研究者却更多关注贫困群体脱贫过程中的被动性,相对忽视了他们本身的能动性、动态性和关系性,无法充分反映他们应对贫困的全貌。基于

收稿日期:2019-05-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的引领型市场体制研究”(18BSH05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优博培育项目(2018YBZZ060)。

作者简介:魏爱春(1989-),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贫困治理。

此,本文将生计策略与抗逆力结合,以渝东 M 镇 105 户建档立卡搬迁户为研究对象<sup>①</sup>,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如何应对贫困并建构抗逆力。通过对 105 户建档立卡搬迁户的定性访谈了解到,他们搬迁后通过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适应新环境,即短距离摆动、长距离摆动、混合式摆动<sup>②</sup>[19]。短距离摆动即搬迁户依靠迁出地的土地资源与迁入地的务工机会维持生计,长距离摆动即搬迁户利用务工地与迁入地的就业收入促进家庭发展,混合式摆动即搬迁户凭借迁出地的土地资源、迁入地与务工地的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初期阶段,这三种搬迁户均较好适应了安置点生活。为实现脱贫致富,在外界力量的介入下,他们开始更新生活状态,由适应走向转换。短距离摆动的搬迁户由个体经营走向合作经营,长距离摆动的搬迁户由雇佣于人走向自主就业创业,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由“个体经营+雇佣于人”走向“合作经营+自主就业创业”。搬迁户应对困境的不同行动暗含动力机制、生计策略及抗逆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 一、适应、转换与抗逆力的探讨

材料物理学派、心理学派认为适应是抗逆力建构的主要机制,如 Woods 等、Garmezy 等指出抗逆力指主体吸收扰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促使主体对极端压力做出回应并在主动适应后仍保持原有发展轨迹,借此他们提出适应是主体应对压力的动力机制<sup>[20-21]</sup>。但他们尚未注意到除主动适应外,主体在应对逆境时还可能出现不同结果。社会生态系统论学者在这一解说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抗逆力建构过程中,行动者还能进行积极转换,即他们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能动性创建新的发展轨迹。如 Holling、Adger 提出行动者除具有回应逆境并主动适应的能力外,还具有转换风险的能力<sup>[22-23]</sup>。他们指出抗逆力的建构不应局限于个体层面的主动适应,还应与更大范围内的家庭、社区、社会等联系,探讨抗逆力建构中的适应与转换。有不少学者认同 Holling 与 Adger 关于抗逆力建构机制的探讨,如芦恒认为乡村振兴过程中,抗逆力的适应与转换机制能够真正激活农民智慧,实现乡村振兴<sup>[24]</sup>。综上所述,学者们虽提出抗逆力建构的两大机制,却止步于宏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未将其进一步操作化并与实践相结合,也未探讨适应与转换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适应与转换紧密相关,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适应结果的良好与否对是否进行转换产生重要影响。

在走访渝东 M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该地建档立卡搬迁户应对逆境的适应与转换。进入安置点后的初期适应阶段,并非所有建档立卡搬迁户都实现了完全在地化<sup>③</sup>。因学习能力与缓冲能力的差异,105 户建档立卡搬迁户中,24%的搬迁户采取短距离摆动并依靠自主经营满足基本生存;47%的搬迁户采取长距离摆动以务工收入维持生计;29%的搬迁户采取混合式摆动通过多样化方式实现家庭发展。通过采取以上三种生计策略,他们在短期内适应了安置点的生活。但为促进长远发展,搬迁户充分利用国家政策与社会力量,更新原有生活状态。短距离摆动的搬迁户依靠集体经济建构起生存型抗逆力,长距离摆动的搬迁户通过就业创业建构起发展型抗逆力,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凭借多样化策略建构起互补型抗逆力。

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搬迁农户,为何在迁入安置点后采取不同方式应对贫困处境?这涉及搬迁农户建构抗逆力的问题。在建构抗逆力时,他们由主动适应走向能动转换。主动适应即搬迁农户的自我调适,他们通过改变种养结构及外出务工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调整。能动转换即实

① 2018 年 6 月至 9 月,笔者前往渝东 M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展开实地调研。该安置点位于距离 M 镇 1.2 公里的 Y 村,安置点建房面积 2.5 万平方米,现已安置移民 215 户,其中入住的建档立卡户与非建档立卡户分别为 115 户、100 户。在相关负责人的帮助下,笔者对安置点中 215 户搬迁家庭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因本文致力于分析建档立卡搬迁户的抗逆力建构,所以没有访谈其中的 100 户非建档立卡搬迁户。本文采取深度访谈的方式展开实地调研,并对 115 户建档立卡搬迁户进行了二次回访。在回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其中 10 户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故最终将 105 户建档立卡搬迁户确定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② 王晓毅将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搬迁户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流动方式称为“摆动”<sup>[19]</sup>,本文也将继续沿用“摆动”概念指称搬迁户在迁入地与迁出地、迁入地与务工地之间的流动。文中出现的三种摆动的划分主要以迁出地、务工地与迁入地之间的空间距离为依据。以迁入地为中心,本镇范围内,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流动称为“短距离摆动”;超出本镇范围,在务工地(其他省市)与迁入地之间的流动称为“长距离摆动”;若搬迁家庭中同时出现以上两种流动方式则称为“混合式摆动”。行文中出现的所有摆动均指这三种,故不再赘述。

③ “在地化”,客观融入当地,文中指的是作为外来者的建档立卡搬迁户融入新环境。

现自主适应后,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搬迁农户变革原有发展轨迹进入新的发展道路。易地扶贫搬迁后,搬迁农户如何通过主动适应应对逆境,如何从适应走向转换建构高层次的抗逆力是本文探讨的事实问题所在。通过对此事实问题的回答,本文意在探究搬迁农户应对贫困的动力机制、生计策略及抗逆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 二、适应:搬迁农户应对困境的自我调适机制

适应是行动者学习、整合经验知识并缓冲风险的能力,通过调整自身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过程的应对能力,行动者得以在现有环境中稳定发展<sup>[25]</sup>。适应暗含行动者的学习能力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即行动者获取知识并将知识转化为功能性活动。缓冲能力即在遭受外部扰动时,行动者仍能维持原有功能<sup>[26]</sup>。从国家层面而言,易地扶贫搬迁旨在改变贫困人口的居住环境,使他们早日脱贫致富。于贫困群体而言,搬迁虽极大改善了居住环境,却也带来众多挑战。渝东 M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基本与 M 镇连为一体,交通便利、市场距离近,村民无需政府动员,均自愿迁往安置点。因该地实行无土集中安置<sup>①</sup>,故并非所有家庭均在安置点实现了生产生活的完全在地化,绝大部分搬迁户通过摆动策略积极适应新环境。因学习能力与缓冲能力的差异,搬迁户内部出现三种应对贫困的生计策略与三种不同的适应水平。

### 1. 以差异化的学习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学习能力指为开发与挖掘潜在资源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行动者通过对知识的转移、模仿、改进与创造提高与环境相适应的胜任力<sup>[27]</sup>。作为理性的社会主体,行动者不仅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经验知识获取收入,更应主动开发新知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人力资本欠缺、信息获取能力较弱是阻碍建档立卡搬迁户适应新环境的关键因素。只有不断更新知识储备、创新生产技能、调整生计策略,搬迁户才能提高生活水平。为分析搬迁户的适应情况,本文将学习能力操作化为户主受教育程度、信息获取能力与家庭教育投资。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未来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甚至对家庭的教育投资发挥重大作用。信息获取能力可具体化为搬迁户获取信息的途径,多元的信息获取渠道能够帮助他们准确掌握市场信息,迅速调整策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家庭教育投资虽短期内会加重搬迁户负担,但作为一项极具前瞻性的投资,其收益却是可观的。

(1) 满足温饱:短距离摆动中的“低水平”适应。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到,24%的搬迁户(25户)通过短距离摆动应对生计困境。首先,这部分搬迁户中,户主文化水平均为小学及以下。与其他文化水平较高的搬迁户不同,这部分搬迁户普遍表示“没得么子文化,哪个要你”,“没读好多书,出外头会被骗”,“自个名字都写不得,只能种田”,这说明受教育程度阻碍他们寻求较好的务工机会。其次,搬迁前,这部分搬迁户居于大山深处,虽偶尔会去 M 镇赶集,但受限与市场的间歇性接触,他们的信息获取途径有限,无法及时调整策略应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最后,家庭教育投资上,这部分搬迁户的子女都未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25户中,11户的子女受过初中教育,其余14户子女均为小学毕业)。他们认为培训虽能增加人力资源拥有量,却指出“那个见效太慢”,不愿为此付出太多成本。

一位搬迁户说:“我们都只读了个三册(二年级),住在高头(山上)也找不到(不知道)外头的变化,他们说可以去搞么子培训,那个见效太慢。我们就是农民,你不种地不得行。”短距离摆动的搬迁户表示种地是他们糊口的根本保障,务农是他们掌握的最基本、最娴熟的生产技能。乡土社会中,他们拥有天然的种地优势,如果丢掉这一优势,他们将面临生计困境。当政府大力倡导土地复垦时,这部分搬迁户选择保留原有宅基地,以重回迁出地务农。迁出地的务农所得为他们在迁入地的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如他们所说“虽不会大富大贵,却也吃食无忧”。农闲时,他们还可回到迁入地寻找一些“低级”活路(诸如下泥、背沙、卸货等苦力活)争取少量收入贴补家用。

(2) 略有结余:长距离摆动中的“中等水平”适应。105户建档立卡搬迁户中,47%(49户)的搬迁户表示在现有土地资源稀少的情况下,摆回迁出地务农无法真正脱贫。这部分搬迁户中,户主年龄介

① “无土集中安置”指农村建档立卡户在政府统一划定的安置地,由政府统一安排生活用地,但并不为其安排生产用地的安置方式。



于 25~39 岁之间,31% 的户主受过初中教育,16% 的户主受过高中教育。易地扶贫搬迁前,他们已靠外出务工维持生计。因长期接触外部环境,他们认为只有接受高等教育、接触优良环境,人才会逐渐向上流动,所以极力支持子女读书。如一位回安置点办事的村民说:“我们经常出门,就知道这个社会你要是没得知识文化,都挣不到么的钱,还要辛苦一辈子。”村民的讲述表达出他对知识文化的重视程度,这样的认知源于他对外部世界的认同与向往。

土地资源拥有量多寡与土地质量优劣也是这部分搬迁户选择长距离摆动的原因。M 镇地处渝鄂交汇中心,群山环抱,地少人多,多数搬迁户原有可耕地面积不足三亩,且旱田占多数,土地质量不佳,他们表示“种地是发不了财滴”。政府大力倡导土地复垦时,他们将宅基地交予国家换取补偿款,水田或租赁于人或送于亲戚,旱田或退耕还林或任其荒废。因受过初高中教育,这部分搬迁户务工期间很快掌握了较高的生产技能,每月可挣得 6 000~7 000 元的工资。即便出现“暂时性失业”并回到迁入地时,他们也可找到诸如开挖掘机、装修房子、泥瓦匠等“高级”活路,每天赚取 200 元左右的生活费。与短距离摆动的搬迁户相较,长距离摆动的搬迁户除满足必需的支出性消费外,还会有部分结余用于精装修安置房、置办家具设施等。

(3) 丰衣足食:混合式摆动中的“高水平”适应。为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29%(31 户)的搬迁户内部出现分工,即中老年劳动力采取短距离摆动的生计策略,青壮年劳动力采取长距离摆动的生计策略。这部分搬迁户多为 5 人户或 6 人户主干家庭,家中均有未成年孙代需要照料。中老年劳动力年轻时也曾外出务工,他们虽没有受过较高等教育,但外出期间体验过因文化水平过低而遭受“白眼”的生活,所以极力支持子女接受教育。青壮年劳动力初、高中毕业后,家庭无力支持他们继续求学,他们像父辈一般远走他乡。长期外出务工后,青壮年劳动力不愿回乡务农。老年劳动力因年龄与文化水平受限,不再适合外出务工。基于现实考量,这部分搬迁户将两种生计策略相结合。

子女务工所得可用于家庭必需的支出性消费,如后代的教育投资与家庭成员的医疗费用等。老人务农所得可用来补贴日常生活消费,减少家庭在购买生活必需品上的支出。“娃娃在外头打工,我们在高头种点田,养点牲畜。他们回来,有点粮食吃。”中老年劳动力的务农所得成为家庭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来源,这极大减轻了青壮年劳动力的经济负担。笔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若搬迁户只依靠务工收入维持生计,他们每月的生活费为 1 000 元左右。若将务工与务农两种生计方式相结合,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农产品均可通过务农获得,这将减少家庭支出,搬迁户可将这部分结余存储或用于其他方面。与短距离摆动、长距离摆动的搬迁户不同,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既可通过长期务工获取较高收入,又可凭借务农满足生活所需。这说明生计策略多样化更利于家庭应对风险、适应环境。

## 2. 规避生计风险,自主适应外部变化

缓冲能力即系统在遭受变化或扰动时,仍能保持原有结构与功能的能力<sup>[28]</sup>。搬迁户的缓冲能力依赖其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又可具体化为各种生计资本。人力资本即搬迁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劳动力数量与质量越高,他们面临干扰时的缓冲能力越强。物质资本表现为宅基地面积、居住设施、家畜拥有量、房屋数量与质量。当遭遇挫折时,搬迁家庭可将物质资本转为金融资本,增强缓冲能力。金融资本是搬迁户的家庭收入和存款,是缓冲能力高低的直接表现。缓冲能力强的搬迁户会通过生计资本的多元组合提高面对迁移决策的有效性,选择更利于家庭发展的策略<sup>[29]</sup>。因资源禀赋的差异,搬迁户应对扰动的缓冲能力迥异。

(1) 短距离摆动中缓冲能力低下,自主适应受限。除户主年龄与文化水平外,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也会影响搬迁户的贫困应对能力。25 户短距离摆动的搬迁户中,7 户是无子女家庭,18 户为空巢家庭。这部分搬迁户户主青壮年时期经常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现多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矽肺病及各种慢性病,他们在劳动力数量与质量方面均不占优势。务农所得仍是这部分搬迁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他们需要保留迁出地的宅基地。一位 61 岁的搬迁户说道:“高头的房子不能交给国家,我们的粮食、农具还要往老屋放。我们身体不好,去到高头还要住一哈。”在迁入地,他们虽住进了新房,但在房屋装修上一切从简。在牲畜拥有量方面,搬迁户只为满足日常口食,家畜数量有限、品种单一。正如他们所说“我们只养了两头菜猪,养多了,你没得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拥有量直接影响金融资本的拥有情况,金融资本的多少又显著地作用于搬迁户维持原有功能与结构的能力。对于这部分

搬迁户而言,他们并没有多余金融资本用于储蓄。农闲时,他们虽可从事“低级”活路换取收入,但每天只能赚取不到100元的工钱,且这种活路不是每天都有。在不出现重大变故的情况下,这部分搬迁户可勉强维生,其风险规避能力极端低下。

(2)长距离摆动中以较高的资本转换能力适应环境。易地扶贫搬迁后,政府虽出台一系列惠农减贫措施,但长距离摆动的搬迁户仍不愿返乡。人力资本方面,这部分搬迁户正处青壮年且受过初高中教育,劳动力质量与金融资本积累能力远胜于父辈。物质资本方面,他们将原有宅基地交予政府换取补偿款,并放弃迁出地的土地资源,或转租于人(依据田地质量,一亩地一年租金100~500元不等),或退耕还林。通过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不断转换,这部分搬迁户增加了金融资本拥有量。据他们讲述,“高头的房子交给国家后,我们拿了补偿款,这个钱大部分要花到娃娃身上,剩下的想拿去再学点么子技术。”外出务工后,他们不仅积累了较多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拥有量也得到极大提升。当务工地遭遇“暂时性失业”困境时,这部分搬迁户可利用所学技能在迁入地找到“高级活路”,较好应对失业处境。因资本拥有量方面具有的优势,他们的风险规避能力稍高于短距离摆动的搬迁户。

(3)混合式摆动中以多样性规避风险。系统内部的多样性益于系统自身的稳定性<sup>[30]</sup>。多样化的生计策略使搬迁户面临一种生计策略无法维持家庭结构稳定的困境时,其他生计策略仍可维持家庭系统的正常运行。从具体实践看,31户搬迁家庭采取混合式摆动的生计策略是他们较好适应环境的结果。务农收入不佳可通过本地务工与外出务工弥补,生计策略多样化提高了他们的风险应对能力。这部分搬迁户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均外出务工,当遭遇失业困境时,他们便回到迁入地寻找就业机会,并帮助父母经营土地资源。老年劳动力一边照顾孙代,一边回迁出地务农。虽务农所得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逐年降低,但可为家庭提供部分生活必需品,这使得青壮年不用将全部收入用于家庭必需品支出,可以有结余用于子女教育,提高家庭未来的生活质量。相较于短距离摆动与长距离摆动的搬迁户,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既整合了二者的优势(农业生产+外出务工),又避免了二者的不足(不用将全部劳动力用于一种生计活动,还可实现生活必需品的自给自足),其缓冲能力明显优于前两种搬迁户。

### 三、转换:外界力量介入下抗逆力建构机制更新

搬迁户依靠自主适应在短期内实现了稳步发展,却无法保证其缓冲能力受到影响时,家庭能在多大程度遵循原有发展轨迹。建构抗逆力时,搬迁户还需得到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大力支持,推动他们由自主适应走向能动转换。转换意味着行动者突破原有发展轨迹进入新的发展道路,这依赖于他们的自组织能力。自组织能力涉及人类制度、权力及社会网络对抗逆力的影响<sup>[29]</sup>。搬迁户的自组织能力即他们通过建立互助网络,顺利融入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除原有关系网外,政策支持、迁入地的邻里关系及各种社会力量均可作为自组织能力的具体化指标。因自组织能力的差异性,以上三种搬迁户出现了不同的转换结果<sup>①</sup>。

#### 1. 短距离摆动:“满足温饱”转向“略有结余”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增加了搬迁户的物质资源,还在经济与人力资源方面给予他们极大支持。短距离摆动的搬迁户通过选择性吸收政府政策,最大限度提升了困境应对能力,合作社的有力介入又提高了他们抵御不确定风险的能力。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这部分搬迁户积攒到少量结余以备不时之需。

(1)政策支持在种养殖业方面的益贫效应显著。经济资源方面,除享受购房补助外,政府还为搬迁户提供一系列资助政策。首先,根据偿还能力高低,政府设立了3~5万元的贴息小额贷款,帮助有技能及还款能力的贫困户脱贫增收。符合贷款条件的搬迁户均提出了申请,并获得3万元的贷款金额,他们将这笔钱用于购买牲畜与作物种子以扩大生产。其次,根据规模大小,政府还为发展种养殖

<sup>①</sup> 此部分主要探讨的是,在外界力量介入下,三种类型的搬迁户如何由适应走向转换,这其中可能会出现三种类型之间的转换。但是,就笔者目前所收集到的资料中,只有3户家庭因务农收入无法维持生计,由短距离摆动转向长距离摆动。因三种类型之间的转换在所有个案中所占比例太少,故文中并没有就此展开讨论,特在此说明。

业的搬迁户提供 3~10 万元的针对性补助。经济资源增加后,这部分搬迁户改变传统种植方式,减少玉米、红薯、土豆的种植面积,更多的土地被种上李子树、核桃树、无花果、烤烟、党参和贝母等。传统农作物向经济作物的转换提高了土地产值,为搬迁户带来更多收益。人力资源方面,为提高农村贫困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政府免费为他们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诸如厨师、水电工、瓦工、家政、电子培训、脆李种植、药材种植及养殖培训等,还为他们提供每天 20 元的误工补贴。这部分搬迁户中,符合年龄要求的均参加了培训活动。技能提升后,他们不仅能够从事精细化的作物种植,还有条件找寻“高级活路”,这大大提升了搬迁户的环境适应能力与风险应对能力。

(2)合作社带动搬迁户实现产业脱贫。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与农民的弱势地位日益显著。政府虽在政策方面大力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但在具体实践中,因大多数贫困户文化水平低,管护技术欠缺,自主经营依旧风险重重。为规避风险,这部分搬迁户以入股的形式加入迁出地的合作社。合作社带动贫困户是产业扶贫模式中的一种,是承接扶贫资源的载体。政府通过资金支持引导贫困户发展产业,贫困户基于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社介入扶贫实践后,因实行专业化管理,政府给予合作社各种补贴,合作社将这些补贴全部用于社员发展。

搬迁户加入的合作社主要有烟草合作社、药材合作社及果树合作社。以果树合作社为例,为带动贫困户发展,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M 镇 Z 村 8 位乡村能人成立了脆李合作社,该合作社采取自愿入社、每股 500 元(一亩地算一股)的形式号召村民积极参与。目前,该合作社共有社员 98 户,果树面积 265 亩。其中,建档立卡搬迁户有 21 户。合作社与搬迁户之间签订合同以明确彼此的义务与权利,搬迁户加入合作社后,合作社为他们提供一体化、专业化服务。种植环节,合作社统一购买树苗,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种植培训,以提高树苗成活率。管护环节,合作社多方走动联系技术人员为社员进行技能培训,并参观其他果树合作社以求取经验。销售环节,合作社负责寻找客商,所得收益由贫困户与合作社共同分享。该合作社负责人说:“今年脆李的收成还得行,这边一个搬迁户只入了一股,也有接近两万块的收入,比自个种田强些。”

## 2. 长距离摆动:“略有结余”转向“丰衣足食”

初期适应阶段,长距离摆动的搬迁户依靠自身维持生计,却缺少最大限度推动家庭发展的资本,来自政府政策、老乡、熟人及职业网络的大力支持弥补了他们的资本不足,促使家庭进入新的发展状态。

(1)政策支持极大提高了搬迁户的就业创业能力。首先,此部分搬迁户不再返回迁出地经营土地,所以他们用原有宅基地换取土地复垦补偿款。其次,这部分搬迁户多为青壮年,他们的还款能力明显高于短距离摆动的搬迁户,其获取的贷款金额普遍为 5 万元,多于短距离摆动搬迁户的 3 万元。经济资源增加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不断提高生产技能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除经济支持外,同样作为贫困户的他们也可以免费参加政府举办的技能培训活动。

利用政策支持,这部分搬迁户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20%的搬迁户由雇佣于人转向自主创业,如经营冷饮店、小饭馆、蜂窝煤店等。一位经营蜂窝煤的搬迁户说:“起先给别个打工,一个月 4 000 块钱。后来有了国家的支持,我们就自个做起了蜂窝煤,一个月差不多可以卖到一万多块。”他们表示自主创业虽辛苦一些,但月收入均可上万,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17%的搬迁户中,户主学习驾驶技术后,一部分购车跑运输,一部分继续为雇主打工。技能水平提升后,他们的收入随之上涨,如一位开挖掘机的搬迁户一个月的收入可达 10 000 元左右。10%的搬迁户接受了职业技能培训,择业自主性得到提升。如有的搬迁户最初只能在超市、工地或饭店从事体力劳动,培训后,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收银员、泥瓦匠或厨师等技术含量稍高的工作。当务工地出现“暂时性失业”时,他们可回到迁入地寻找较为“体面的”工作。

(2)社会关系网的整合提升了搬迁户的行动能力。社会关系网于行动者至关重要,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越大,他与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人之间的联系形式越多样化,在社会上灵活处理事情的能力就越强”<sup>[31]</sup>。对于长距离摆动的搬迁户而言,进入务工地找寻工作的过程中,原有关系网中的“熟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熟人”是关系网中个人能求助的人,是一些处于一定有利地位、能影响某些利益进行再分配的人。由于先前存在的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及其他交往中的恩惠,人们能够依赖熟人



得到某些利益<sup>[31]</sup>。乡村社会原有的同质性关系网为搬迁户提供了极大便利,“熟人”“老乡”组成的情感型关系圈改变了他们在大城市的落寞处境。但身处陌生环境,情感型关系已不是搬迁户可利用的主要关系。为改变生存状态,他们需不断建构新的关系网。正如一部分在大城市自主创业的搬迁户所言,“出门在外都是靠别个帮到起的”。

在务工地无法取得可观收入时,搬迁户会返回迁入地寻找就业机会。在迁入地寻找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关系网同样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娱乐活动获取就业信息是搬迁户实现不充分就业的主要缘由。搬迁户表示“我们的工作都是跟这边的人打麻将、整酒的时候得到的信息”。通过娱乐活动建构的职业网络,不仅满足了搬迁户的情感交流需求,也为他们获取就业信息提供了重要来源。从社会网络的实践样态看,搬迁户社会关系网的变迁实质是社会网络重新整合的过程,社会网络的有序维持影响搬迁户的生存与发展,为他们的能动转换提供机遇。

### 3. 混合式摆动:“丰衣足食”转向“富富有余”

自主适应阶段,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结合短距离摆动与长距离摆动,通过务农与务工两种生计方式主动应对生计困境,促进家庭快速发展。能动转换阶段,他们在已有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政策与迁出地、迁入地、务工地的多样化支持,更新发展状态。在多元力量的促进下,这部分搬迁户进入新的发展轨迹。

(1)充分利用政策支持促进家庭快速转换。经济支持方面,首先,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中,青壮年劳动力是小额贴息贷款的主要申请者,贷款金额全部为5万元。他们将贷款用于提高技能水平、子女受教育水平、购买交通工具(摩托车、电动三轮车)及经济作物等。其次,道路设施完善后,这部分搬迁户无需保留原宅基地,他们通过土地复垦换取国家给予的补偿款。再次,中老年劳动力仍继续经营土地资源,所以他们还可得到政府给予的种养殖补助。经济资本增加的情况下,中老年劳动力改变原有生产方式,扩大经济作物种植规模。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务工收入逐年上涨。一位种植烤烟的搬迁户说道,“种了烤烟以后,我们老家伙一年的收入也有3万块左右。娃娃出门打工的收入也涨了,原先每月有7000多块,现在有1万多。原先生活就蛮好,现在更好哦。”

技术培训方面,政府举办的技能培训活动同样适用于他们,搬迁户中符合培训要求的均参加了培训活动。通过学习技术知识,无论在迁入地与务工地寻找就业机会,还是在迁出地经营种养殖业都极大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以种养殖业为例,培训前搬迁户大多凭借已有经验从事农事活动,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家庭收入受限。培训后,他们将科学与已有经验相结合,种养殖更加专业化,收入随之上涨。搬迁初期,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较好适应了安置点的生活,生活水平虽优于前两种搬迁户,但仍缺少促进家庭快速发展的资本。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发展资本,通过变革原有发展轨迹,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不仅提高了风险应对能力与环境适应能力,还实现了家庭的快速转换。

(2)社会网络的多样化促进搬迁户的最优发展。社会网络中获取的支持是家庭从其他社会主体中得到的帮助及扶持,其本质上属于一种集物质帮助、生活扶持与心理慰藉等于一体的社会性行为<sup>[32]</sup>。良好的社会网络帮助弱势群体获取各种资源,提高行动能力。社会网络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再是社会支持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会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建构对自身发展有利的社会网络。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搬迁家庭应对风险的社会网络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搬迁家庭应有主动建构社会网络的意识;其次,在有了这种意识后,他们应在现有条件下积极寻求有利的社会网络。政府有关易地扶贫搬迁宏观层面的支持由政策引导,并不一定能满足所有搬迁家庭的现实需求。这要求他们排除障碍,积极建构、拓展社会网络。

在迁出地,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最初通过自主经营管理土地资源,后为规避风险、谋求长远发展,自愿加入合作社。加入合作社后,搬迁户不仅降低了自主经营风险,还实现了收入的稳步增长。除获取经营土地的所得收入外,他们还能得到合作社给予的分红与种植奖励,这对于搬迁户而言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在迁入地,他们通过娱乐活动获取就业信息,并充分利用社会支持促进发展,如M镇安置点内扶贫车间的兴办就为搬迁户带来了福利。该扶贫车间主要生产运动鞋,鞋厂工人多为安置点中的女性劳动力。鞋厂的开办不仅提高了搬迁户的技能水平,还增加了他们的家庭收入。一位在扶

贫车间工作的搬迁户说：“原先我就在家带娃娃，没得收入。现在在鞋厂，一个月有 2 500 块钱。”在务工工地，搬迁户不断提高技能水平，充分利用务工工地的强关系与弱关系网开展就业创业活动，促进家庭进入新的发展状态，实现最优发展。

#### 四、结论与启示

现行的抗逆力不同于传统工程学意义上的抗逆力。工程学意义上的抗逆力强调压力与回弹，现行的抗逆力则强调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适应与转换。适应与转换都需要一种抗逆力思维，抗逆力强调主动适应基础上的积极转换，是一个应对风险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凭借适应机制应对风险环境，并在适应的基础上，通过能动转换建构高层次的抗逆力。基于行动能力的差异性，行动主体会选择不同的生计策略，最终他们的抗逆力结构也大不相同。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中，在政府专项政策与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建档立卡搬迁户主动提高学习能力、缓冲能力与自组织能力。如图 1 所示，因动力机制的差异化作用，搬迁户内部出现三种应对贫困的生计策略，即短距离摆动、长距离摆动与混合式摆动。由适应走向转换的过程中，他们依靠不同的生计策略建构了不同的抗逆力。短距离摆动的搬迁户通过自主经营与集体经济最大限度提高土地产值，但因自身行动能力有限，他们建构起满足基本需求的生存型抗逆力。长距离摆动的搬迁户通过就业创业活动不断提升资本转换能力，建构起发展型抗逆力。混合式摆动的搬迁户通过家庭劳动力的明确分工，将短距离摆动与长距离摆动相结合，实现了由自主适应到能动转换的快速转化，建构起互补型抗逆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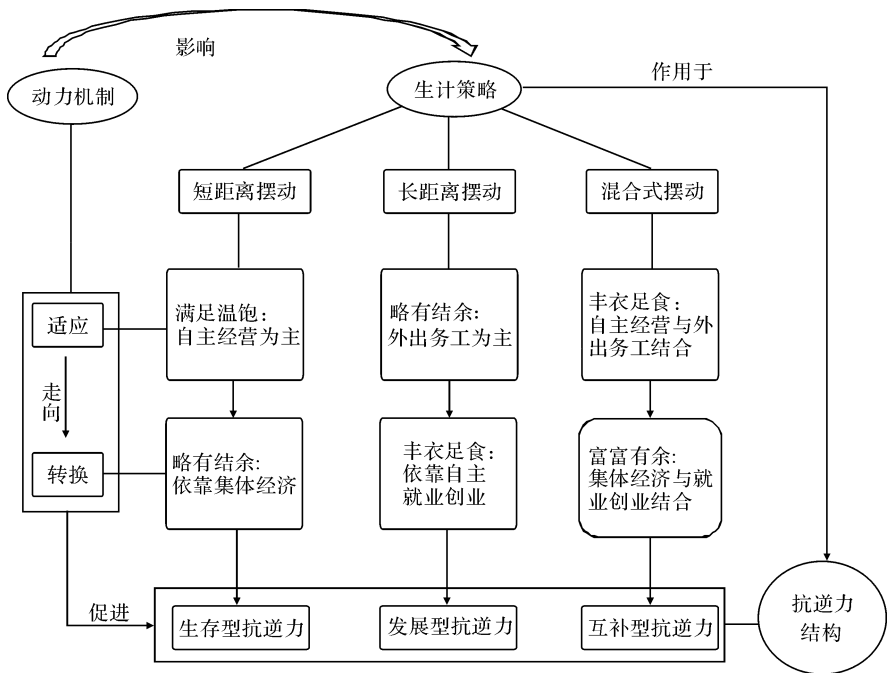


图 1 搬迁户应对贫困的动力机制、生计策略与抗逆力结构之间的关联

抗逆力视角与易地扶贫搬迁相结合的研究表明，抗逆力的建构不仅能够促进贫困群体的生计可持续，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及农村社会的发展。为早日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继续致力于个体抗逆力、家庭抗逆力、社区抗逆力及政府抗逆力建设。在个体抗逆力方面，应充分重视农村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技能水平，鼓励他们采取主体性行动，积极适应并转换不确定风险。贫困群体个体抗逆力的成功建构对于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作用显著。在家庭抗逆力方面，应充分利用乡村传统文化对乡村贫困家庭的结构功能、沟通方式与价值观念等进行适当调适，激励他们选择最有利的生计策略，通过生计方式的多元组合推动家庭形成稳定的逆境应对模式，助推乡村振兴。在社区抗逆力方面，应通过提高资源蓄积力、自治力与地域内贫困群体之间的合作力



建构社区抗逆力,如为贫困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开发特色产业、支持兴办合作社等。社区抗逆力的成功建构为个体抗逆力与家庭抗逆力提供多种资源支持。在政府抗逆力方面,应通过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加大对个体、家庭及社区的支持力度。个体抗逆力、家庭抗逆力、社区抗逆力与政府抗逆力建构的过程也是乡村不断振兴的过程,抗逆力与乡村振兴密不可分。抗逆力建构中的两大动力机制能够最大限度激发贫困群体的创新性,助推乡村振兴的真正实现。

## 参 考 文 献

- [1] 邢成举. 搬迁扶贫与移民生计重塑: 陕西省证据[J]. 改革, 2016(11): 65-73.
- [2] 李培林, 王晓毅. 移民、扶贫与生态文明建设——宁夏生态移民调研报告[J]. 宁夏社会科学, 2013(3): 52-60.
- [3] 金莲, 王永平, 黄海燕, 等. 贵州省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3(4): 404-407.
- [4] 叶青, 苏海.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 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64-70.
- [5] 郑瑞强, 施国庆. 扶贫移民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 42-47.
- [6] 陈绍军, 田鹏. “嵌入”: 移民社会系统重建的新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22-30.
- [7] 周恩宇, 卯丹. 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2): 69-77.
- [8] 徐锡广, 中鹏.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8(1): 103-110.
- [9] 宁静, 殷浩栋, 汪三贵, 等.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11): 20-28.
- [10] 高聪颖, 吴文琦, 贺东航. 扶贫搬迁安置区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6(9): 91-97.
- [11] 束锡红, 聂君, 樊晔. 精准扶贫视域下宁夏生态移民生计方式变迁与多元发展[J]. 宁夏社会科学, 2017(5): 147-154.
- [12] 金梅, 申云. 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7(5): 70-81.
- [13] 汪磊, 汪霞. 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演化及其对增收的贡献度分析——基于贵州省的调查研究[J]. 探索, 2016(6): 93-98.
- [14] 马流辉, 莫艳清. 扶贫移民的城镇化安置及其后续发展路径选择——基于城乡联动的分析视角[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3): 167-174.
- [15] 王磊, 李聪.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多维贫困测度与致贫因素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9(3): 119-128.
- [16] 王春光. 政策执行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1): 108-117.
- [17] 何得桂, 党国英. 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大规模避灾移民搬迁政策效应提升研究——以陕南为例[J]. 西北人口, 2015(6): 99-105.
- [18] 付少平, 赵晓峰.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8-16.
- [19] 王晓毅. 从摆动到流动: 人口迁移过程中的适应[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1(6): 50-54.
- [20] WOODS D, BRANLAT J. Resilience engineering in practice: a guidebook[M]. Boca Raton: CRC Press, 2011: 127-143.
- [21] GARMEZY N. Stress, competence, and development: continuities in the study of schizophrenic adults, children vulnerable to psychopathology, and the search for stress-resistant children[J]. Orthopsychiatry, 1987, 57(2): 159-174.
- [22] HOLLING C.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4): 1-23.
- [23] NEIL A. Social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are they related?[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 24(3): 347-364.
- [24] 芦恒. “抗逆力”视野下农村风险管理体系创新与乡村振兴[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1): 101-110.
- [25] CARL F, STEPHEN R, CARPENTER, et al. Resilience thinking: integratin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J]. Ecology & society, 2010, 15(4): 299-305.
- [26] STEVE C, BRIAN W, MARTY A, et al. From metaphor to measurement: resilience of what to what?[J]. Ecosystems, 2001(8): 765-781.
- [27] 胡汉辉, 潘安成. 组织知识转移与学习能力的系统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06(3): 81-87.
- [28] IFEJIKA S. Buffer capacity: capturing dimensions of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in African smallholder agriculture[J]. Reg environment change, 2013, 13(3): 521-535.
- [29] 杜巍, 牛静坤, 车蕾.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生计恢复力与土地政策的双重影响[J]. 公共管理学报, 2018(3): 66-77.
- [30] 万金红, 王静爱. 从收入多样性的视角看农户的旱灾恢复力——以内蒙古兴和县为例[J]. 自然灾害学报, 2008(1): 123-127.
- [31] 杨美惠.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107-109.
- [32] 方曙光. 社会断裂与社会支持: 失独老人社会关系的重建[J]. 人口与发展, 2013(5): 89-94.